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文坛故旧录

赵家璧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文坛故旧录

——编辑忆旧续集

赵家璧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故旧录 / 赵家璧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21-8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编辑工作-中国-史料
②出版工作-中国-史料 IV. ①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14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文坛故旧录

赵家璧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21-8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赵家璧，中国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1908年10月27日生于上海松江。在光华大学附中时，即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



国学生》。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

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协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编审。1972年退休，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

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

编辑说明

赵家璧是一位现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入职不久就展现出自己是一位非常有为的青年编辑的才华，他当时利用图书公司阵地，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郑伯奇等前辈帮助下，广泛联系进步作家群——尤其一些“左联”革命作家，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中外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揭露黑暗，鼓吹光明，鼓舞抗战士气，保存下了不少文化资料，影响巨大。

这三本《编辑忆旧》（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文社 1981 年 9 月版）分别是编辑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译出版《苏联作家七人集》“美国文学丛书”、几本外国木刻集等的编辑札记、书信往来以及从业经验谈、回忆录等。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历史。

这次整理重版，主要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之处，并针对原版中有关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的不严谨表述词句根据新规更正为“1949 年前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有关丛书、文库、大系等非书名而是集成的图书，根据新规把原有的书名号《》更正为引号“ ”予以标示。特此说明。

总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目 录

总序	郝振省 (1)
----------	---------

编辑与作家

鲁迅印象记	3
鲁迅书简“完璧”归赵	8
关于《北平五讲》和《三十年集》	14
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时的一件往事	21
曹靖华与鲁迅	27
编辑生涯忆茅盾	30
从茅盾给我最后一信想起的	63
老舍和我	78
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运	160
巴金与“良友”	166
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	170
悼念郑伯奇	219
蔡元培先生二三事	223

哀胡愈老	228
忆往事学叶圣老	234
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几件事	241
回忆徐志摩与陆小曼	271
与夏衍的一封信	284
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	288
葛琴有话要说	293
尼采译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学	305
李桦、野夫与《新中国版画集》	323

国际文化交流

关于“美国文学丛书”	337
“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的苦难历程	343
怀念仓石武四郎	361
内山书店两兄弟	367
访日归来谈连环画的改革	373
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到中国	384
后记	393

编辑与作家

鲁迅印象记

我有幸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总经理伍联德委托我专管文艺书，他打算在这一领域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业的志愿。正巧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为了躲避敌人耳目，改名君平，来编辑《电影画报》。从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产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艺书的想法。我最先计划编一套“良友文学丛书”，不但要在外形上独创一格，而且在内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家执笔。谁来带个头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鲁迅。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

文坛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把鲁迅说成是严峻、怪癖，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当我们在内山的会客室一起坐下时，我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其实，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况向鲁迅介绍了。当我恳求他为丛书写稿时，他就亲切地问我为什么对文艺编辑工作发生了兴趣。接着他谈了他自己过去办未名社、朝花

社等几个出版社的甘苦经历，最后说：“这是对今天的社会极为需要的事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那天谈话的结果，鲁迅慷慨地给了我两部翻译苏联短篇集。临别时，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要回去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还在另一套“一角丛书”里连续出了丁玲、周起应（周扬）、钱杏邨（阿英）、沈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头上来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的门市部大玻璃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特务用大铁锤击破，还以良友公司为例，向同业散发了恐吓信。不久，文化特务姓汤的，以卖稿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当我把后一件事告诉鲁迅时，他一方面安慰我，鼓励我不要害怕，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勿莽撞硬拼，并经常赠书给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他把上述两件事都写进了文章中去，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读者还可以从《中国文坛的鬼魅》和《准风月谈·后记》中，看到这两件小小的史迹。

鲁迅对左翼青年作家，关心他们的创作，为他们修改文稿，有的为之作序，有的介绍出版。我就从鲁迅手中接受出版过好几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鲁迅还关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其中对丁玲的事，给我印象最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鲁迅通过郑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立即出版，并且要在《申报》上大登广告，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间，该书大受读者欢迎。年底结账，作者应得版税为数可观，但作者湖南常德家乡来信要求领取版税者不止一人，会计科颇感为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鲁迅有事来良友公司看我，我顺便把此事请教他。他

回去替我们打听到了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的确切地址，写信给我说：“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收到，再行续寄为妥。”当时丁玲的老母幼儿住在常德，生活极为困难，鲁迅对她们亲切的关怀，周到的设想，多么感人啊！无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参加四届文代会期间去医院看望丁玲，第一次把这件发生在四十余年前的旧事告诉她时，她久久地说不出话来，然后嘘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语着：“对这些事，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啊！”说话时，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

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之类；有一种极左论调，认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导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以便“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经过两次尝试，一事无成。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他劝我不要再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霸头”了。他开玩笑似地对我说：“你再去找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接着他对我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这次任务虽未完成，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鲁迅来良友编辑部为《苏联版画集》选画。在我那只有十多个平方米的编辑室里，他坐在我的写字

椅上，把入选的放在左边，不要的放在右边。等他工作完毕，已近下班时分。我请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接连咳嗽起来，我才发觉这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这一天，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业绩抱病选画的情景，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良友”，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他就病倒了。鲁迅曾答应为画集写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连每天必写的日记都停了；美国医生发现他的肺病已进入最后期，也在这个时候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许广平代笔书写。序文中说：“参加选画是做到了，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也不能做。”最后说：“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我们可以想象他虽在大病之中，天天发高烧，还念念不忘于这部版画集的出版。鲁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经受着重病的折磨，还要在病榻上如约地写出新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转，鲁迅又为老朋友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的出版热心起来了。经过函商，八月底，我们接受出版。鲁迅又忘我地为住在北平的译者代为编选、设计插图，并写信告诉我，因为译者“学校已开课，他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所以要我把清样送鲁迅校阅，他还要为此书写一篇序文。他处处想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觉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写下了那篇立下七条遗嘱的《死》。九月七日，我复他信中曾答应过一个月内可把清样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译稿清样尚未寄去。鲁迅等得不耐烦了，写了一封简信给我。信中说：“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